

“法官,最后一笔工资到账了,请放心”



调解员吴永青(右)与双方代理律师充分沟通后,促成各方形成共识,律师和吴永青握手表示感谢。

“先别急着拍桌子,听我把账算完”

老李是荣阳本地人,在这两家重工、建筑设备企业干了十几年。说是“两家”,其实工人们早就分不清了——今天在这个厂区干活,明天调到那个厂区;这个月工资从重工公司发,下个月又从设备公司走;社保更是断断续续,有时候这家交两个月,有时候那家补三个月。

“干了十几年,我都说不清自己到底是谁的员工。”老李后来回忆时苦笑着说。

像老李这样的工人,一共有116名。2022年到2024年间,市场行情下行,两家企业资金链断裂,生产停滞,工资发不出,养老保险也停了。工人们一次次找企业协商,得到的回复从“再等等”变成了“我们也没办法”。

“我们不是不通情理,知道企业难。”老李说,“可一家老小要吃饭,社保断了以后怎么办?”

2026年1月底,116名劳动者分批向荣阳法院递交了起诉材料。法院梳理后发现诉求分三类:5人只讨工资,52人要补缴养老保险,剩下59人两项都要。人数多、诉求杂、账目乱,企业一开始推诿扯皮,工人们情绪激动。

案子分到了退休返聘的银发法官吴永青手里。吴永青在荣阳法院干了几十年,当过山区法庭庭长,办过1800多件案子。可这回,连他都倒吸一口凉气——100多人、两家企业、三年的工资和社保,光用工台账就堆了半

人高。

调解团队兵分几路:有人一头扎进账本堆,逐一对照工人们的人职记录、岗位台账、工资流水、社保缴费凭证;有人搭建了微信调解群,把工人们代理律师刘律师、企业方的代理律师侯律师都拉了进来,方便随时沟通案件进展;同时定期组织线下座谈,打通劳资双方沟通壁垒。

可第一次正式调解,就卡住了。企业负责人拍着桌子:“经营亏损,哪有钱发工资?”消息传到工人那边,工人们情绪激动,局面一度十分紧张。

吴永青没有急着说教。他把企业负责人单独拉到一边,摊开整理好的用工台账:“您先别急着拍桌子。116名工人背后是116个家庭,这笔账您算过吗?混同用工的法律责任,两家企业连带承担,全部进入诉讼的话,光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赔偿金加起来是多少,您心里有数吗?”

企业负责人沉默了。转过身,吴永青又对情绪激动的工人代表说:“企业真倒了,你们的工资更没着落。给我点时间,也给他们点时间。我们要的不是两败俱伤,是把钱拿到手。”

从“斗气”到“坐下来谈”

可事情没那么容易。企业负责人嘴上答应调解,实际上还是消极应对,能拖就拖。工人们等得心焦,代理律师刘律师在群里反馈过多次,工人们反复追问进展,有人甚至表示“不想再等了,直接

开庭算了”。

调解一度陷入僵局。吴永青没有放弃。他带着调解团队一次次往返于法院和企业之间,有时为了核实一笔工资发放记录,能在财务室坐上整整一下午;有时为了一个社保补缴的基数,和企业会计打十几通电话。

“我知道企业确实困难,”吴永青后来回忆说,“但工人的钱是血汗钱,拖不得。两边都有难处,关键是怎么找到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。”

调解团队合计出了一个办法:从116人中挑几个诉求典型、调解意愿强的工人,先谈出一个样板来——工资怎么算、社保怎么补、分期怎么付,标准统一了,其他人照着办就行。这就是团队后来总结的“示范调解+分层处置”。

第一批3个工人已经谈妥了。调解协议一签,吴永青通过刘律师把协议转发给工人代表们看:“大家看看,这是第一批的结果。工资核算标准、社保补缴方式、分期付款安排,都写清楚了。能接受这个方案的,我们一个一个个来。”

消息在工人中间传开后,大家看到有人谈妥了、标准也公平,逐渐放下心来。工人代表回复刘律师:“我们同意这个方案,什么时候轮到咱们签?”

有了样板,剩下的调解顺畅多了。调解协议陆续签署后,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——116个人的诉讼费缴纳、调解书签收,每一笔都要盯着,一个都不能落下。

吴永青的手机里,那个叫“劳动争议专案调解组”的微信群,群成员除了他,还有工人们委托的刘律师、企业方委托的侯律

□ 许 力 曹红歌

师。从6月初开始,这个群就成了“进度播报站”,所有缴费、文书接收的进展都在这里汇总、跟进。

116份协议,一个都不少

6月18日,吴永青最后在群里发送了提醒:“所有文书已全部发送,请及时点击接收。有问题及时通报!”刘律师和侯律师几乎同时回复:“收到。”

从90人到112人,再到116人全部完成——这个微信群里的数字一天天在变,每个“收到”背后,都是一份调解书正在送达的路上。

一个月里,116名劳动者陆续与两家企业签订调解协议。荣阳法院依法出具调解书,对协议内容进行司法确认。

协议采用分期支付方式——工资分批发放,社保逐一补缴。企业不用一次性掏出巨款导致停产,工人的权益也有了白纸黑字的保障。

企业负责人松了口气:“本来以为要耗上半年打官司,没想到综治中心和法院一次性把100多人的诉求理清楚了,还体谅我们资金紧张允许分期付款。有了法院调解书,我们心里踏实,生产经营也稳住了。”

如今,两家企业生产经营逐步恢复。而吴永青的手机里,那个微信群早已安静下来。

这场涉及116人的集体劳动争议,没有进入诉讼程序,没有一场庭审,没有一份判决,靠的是一位退休法官的耐心、一个调解团队的努力,和“综治中心+法院”联动平台的力量。



“压在我心头的石头落地了!”

当事人 肖相坤/口述 姜郑勇 陈 帅/整理

“拖了整整十年的欠账总算理顺了,现在不光钱拿回来了,我和藏族师傅那么多年的交情也没闹僵,苏法官是真的懂我们!”

318国道,这条连通内地与雪域高原的交通大动脉,车来车往。我的修理铺就开在川藏线上的始阳镇。前些年,国道上重载货运大车排成长龙,跑高原的司机常年往返,我们铺子天天都有熟客。偶尔遇上师傅们跑完一趟货没拿到现钱,我心想大家都不容易,就大方说:“没事,先记账,等手头宽裕了再给。”

这一记,就是十年。几十名司机的欠款一笔笔记在本子上,欠条攒了厚厚一叠。后来,雅康高速建成通车,分流了一些车辆,修理铺的生意也淡了下来。好多司机常年跑长途,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,账就这么一拖再拖。夜里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看着那些泛黄卷边的欠条,心里不是滋味,那可都是起早贪黑挣的血汗钱。

最厘不清的,要数雅江县藏族司机仁青的账。最早的一笔记账已经是2014年了,他汉语说得不利索,我俩隔着几百公里,电话里越沟通心里越堵。我好心给他“挂账”,到头来他却不认!

思来想去,我抱着一沓皱巴巴的欠条,硬着头皮走进了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始阳人民法庭。

盯着墙上的“新茶马古道纠纷驿站”,我心里直打鼓,这些“烂账”到底能不能收回来?办理我案件的是苏宝琳法官。她详细了解前因后果后,耐心解释:“你们俩的这个纠纷最好先调解,毕竟来往这十多年,不要因为藏汉语言不通影响多年的友谊。就像我们的茶马古道,延续千年,藏汉情谊都刻在路上。”

苏法官把我带到法庭的“石榴籽”双语调解室,打开互联网法庭远程连线仁青,用流利的藏语说道:“我晓得你常年在外面跑运输,一大家子都靠你挣钱,压力不小。”

几句话下来,仁青紧绷的情绪松弛下来,在电话里大倒苦水:“法官,我不是想赖账,只是虫草卖掉之前,实在拿不出这笔钱,过去好几年的账,我自己也记混了。”

她拿着我的账本,用藏语跟仁青仔细核对,一笔一笔扣减。十年乱糟糟的旧账,半个多小时就理得明明白白。

苏法官对着仁青说:“老板当初体谅你难处,愿意账赔给你,是看重咱们藏汉同胞的情分,欠钱不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”

看着仁青的态度转变,我内心的气也消了一大半。仁青也诚恳表态,一分不少把欠款还清,可他现在只能拿出6000元现金。

苏法官沉思片刻后说:“茶马古道自古就有以物换物的传统,要不咱们商量个折中的办法,先还6000元,剩下的用虫草抵扣?”

我俩听完后都同意,当场在线签好了调解协议。仁青立刻转来6000元,过了几天,又收到60根虫草,压在我心头的大石头,总算落地了。

后来,了解到附近的商铺有不少类似情况,始阳法庭先是集中帮商户化解了100多件同类欠款纠纷,又牵头组织了行业座谈会,免费给我们发放标准化交易合同、记账凭证范本,手把手教我们规范交易、留存证据,从源头上避免了账账纠纷。

现在我依旧守着国道旁的修理铺,但我再也不怕遇到难事,我知道,这里有个法庭,会一直守护这条新茶马古道。

基层法庭故事

为了孩子,他们组成了“园丁”小队

本报记者 吁 青 本报通讯员 陈康秀 郑思进

“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关爱,我都牢牢记在心里,将来要做一个像你们一样的人,去帮助别人!”近日,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花山人民法庭法官刘婧,收到一封从湖南省长沙市寄来的信,写信的是10岁孩子小蒙(化名),字迹稚嫩却格外认真。

故事还得从小蒙三岁那年讲起,原本小蒙与父母一家三口都在花都工作生活,母亲离家出走后音讯全无。在他9岁时,与小蒙相依为命的父亲又突然离世,孩子一夜之间成了无人照料的事实孤儿。

远在湖南的姑姑闻讯赶来,忍住悲痛料理后事,又把侄子接回老家。可难题接踵而至——姑姑不是法定监护人,孩子的学籍、医保办不下来。

万般无奈之下,姑姑向花山法庭提出申请,请求撤销小蒙母亲的监护人资格,改由自己担任监护人。案子到了法官刘婧手里,她翻着卷宗心里沉甸甸的。孩子现在吃得饱吗?睡得安稳吗?姑姑虽有一腔疼爱,能不能把孩子照顾好?这些牵挂让刘婧坐不住。

于是,刘婧决定启动花山法庭家事解纷的“花园计划”机制,先把情况摸个透。

“‘花园计划’——护苗与家庭修复机制,是以‘家庭如花园、孩童似幼苗、司法工作者为园丁’为理念,联动学校、社区、心理咨询机构等社会力量,通过专业赋能、多元协同、全流程守护,为困境家庭修复关系生态,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屏障。”刘婧介绍。

她委派家事调查员到村里、学校走访,发现小蒙接连失去至亲后性格变得极为内向,几乎不怎么主动说话,加上姑姑和他还未建立起真正让彼此安心的监护关系,孩子缺的远不只是一张判决书。

为了不让判决变成一纸空文,刘

婧联络了心理疏导员,组成一个“园丁”小队,直奔千里之外的长沙。

到达后,她们先和村委会干部聊,得知小蒙回村后没什么朋友,功课也跟不上。心理疏导员便坐到孩子身边,轻声聊天、画画。

小蒙的眼神里终于闪过一点光亮。疏导员握住他的手说:“爸爸一定盼着你好好长大。现在有姑姑疼你,有法官阿姨们挂念你,你并不孤单。”孩子点点头,嘴角轻轻扬了起来。

另一头,刘婧则和姑姑促膝长谈,细细教她怎么留意孩子的情绪变化、怎样沟通才不让孩子觉得又被抛弃。

姑姑听得认真,红了眼眶说:“以前光想着给他吃饱穿暖,真不知道孩子心里憋着这么多事。”

一圈看下来,刘婧心里有了底,“幼苗”正在适应新土壤。临别时,她送给小蒙一个新书包和一些文具,嘱咐他安心读书。

回到花都后,刘婧根据调查和实地了解到的情况依法作出判决:撤销小蒙母亲的监护人资格,指定小蒙姑姑为监护人。判后她特地叮嘱:“望尽心尽责,护孩子茁壮成长。”

案子虽然结了,刘婧心里始终记挂着那株远方的“小苗”。

刘婧随后就建起了“护苗档案”,并积极联系小蒙当地的社工组织,委托社工每季度回访孩子的生活、学习和心理状况。

同时,积极与民政部门对接,经核查认定后把小蒙纳入了花都区政府的困境儿童保障体系。如今,小蒙每月能领到生活补贴,看病可以按比例报销,学籍也顺利落了地。

姑姑闻讯在电话里激动地说:“以前最怕孩子生病、上学没着落,现在有花都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托底,心里踏实多了。”

“我能感受到这跨越千里浓浓的谢意,我更希望我们的司法温度能透进孩子的内心,生出向阳的枝芽。”刘婧说。

跟着法官去送法

雪宝山上,家庭教育指导进农家

万岳乐/文 边俊铭/图



图①:法院干警利用“5G车载便民法庭”宣讲家庭教育法治知识。

图②:法院干警通过坝坝会解答群众的育儿疑问。

图③:法院干警和群众交流家庭教育情况。

图④:法院干警以案说法,向村民讲解科学和依法带娃的重要意义。

